

求索的足迹

——记著名考古学家吕遵谔教授

杜水生 何嘉宁

1949年，共和国刚刚诞生，20岁的吕遵谔便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共和国的缔造者们敏锐地意识到：只有弘扬民族文化，促进科学发展，才能真正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才能真正地做到富国强民。历史上，中华民族曾长期领先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近百年来，列强不仅残酷地统治中国人民，也肆无忌惮地猎取大量珍贵文物。因此，如何发展祖国的文物考古事业就摆在了

组，同时从历史系本科生中选拔5名学生作为第一届考古专业学员，其中就有吕遵谔先生。可能由于中学时代就对周口店猿人遗址有了一些了解，也可能是从小对自然知识有着更多的喜好，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旧石器时代考古专业，从而也开始了他漫长的考古生涯。

师从名家 刻苦学习

4年而壁，挑灯苦熬，北京大学的学生时代过去了。

室（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名家荟萃，一些蜚声海内外的科学家云集于此，如杨钟健教授、裴文中教授等。同时还有大量的藏书和丰富的标本。为了学习鉴定哺乳动物化石，吕遵谔先生把动物的上下左右牙齿分别装在上衣的四个口袋里，以至最后一摸即知是何种动物的第几个牙齿。为了培养动手能力，他常常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向技术精湛的技工师傅学习修理化石、翻制模型。每每谈到这些，吕先生总无不

各种知识第二记忆使帮助我们在实践中深化书本现象，第一次他会详细讲解，给予解释，第三次则要求自己思考。正是凭借这一时期的扎实功底，在日后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我有了第一

实验考古 探求真知

实验考古，这是北大旧石器考古学的一大特色。当问及原因时，先生说：为什么发展实验考古学？这恐怕缘于五六十年代那场关于骨器问题的争论。当时关于周口店中国猿人是否使用骨器，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

本。在制作过程中，他白脏、不怕累，即使在臭味熏天，他们也没险。这样，经过几十年的考古教研室的标本标本为国内所罕见。

生、经与裴
选择了大型
吸髓破损骨
考古系与北大
每星期学生到
四骨肉类勘物而
进行显微镜下观
王博士母数。从

生物繁殖的对象，也是因为肉类动物的嗜食对象。因此我们必须取实践知识，能多区别不同原生力量所产生的特征时，才能做结论。如果竟然确认非人类的智力为弱器，不但对认识生物学，甚至人类学都有很大的影响。

卷之三

The image shows a blank slide with a light gray background.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there is a large, solid orange rectangle. To its immediate right is a smaller, solid dark red rectangle. The rest of the slide is empty and white.

生先后在兰州大学、武汉大学、湘潭大学为考古专业开设旧石器时代考古、考古学史、考古摄影等课程。

即使这样,由于我国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正常的培养渠道仍不能满足各地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为此,吕先生在教学之余还常去各地办速成班。1974—1975年,为配合三峡工程,为沿长江各省举办了两期考古训练班,每期人数达20—30人。1999年3—4月,应洛阳文物局的邀请,70高龄的吕先生对洛阳市全体文物干部进行旧石器专业培训,在这些培训中实行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办法,一边为学员讲授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方法,一边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既开展了工作又培养了人才,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文化革命结束后,为了适应新时期考古学发展的需要,吕遵谔教授又担负起培养硕士、博士旧石器考古专门人才的重任,为此他又在课程设置和科研计划上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经过十几年探索,目前北大成为国内唯一的旧石器考古硕士、博士培养基地,现已有20多位研究生毕业走向不同岗位,无论是在大专院校,还是科研第一线都成为当地的骨干力量。1998年2月为感谢吕先生的培育之恩,来自湖南、安徽、河南、山西、北京等地的20多位研究生举办了吕先生70华诞暨学术讨论会。其中关于湖南玉蟾岩、江陵鸡公山、陕西洛南盆地旧石器的报告都在近年先后跻身于中国考古学十大发现行列。

科学研究 重大发现

吕遵谔教授长期以来一直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但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从事科学研究,探索一种科研与教学

相互促进的模式。

1960年他赴内蒙古林西地区进行考古调查,首次提出“红山文化”可作为不同于中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类型。

文化革命开始后,正常教学尚不能进行,科研工作更无从谈起。1972年刚恢复招生的历史系考古专业为配合三峡工程在湖北、四川进行考古调查,虽然当时生活非常艰苦,经常仅有土豆充饥,但在为期二年的洞穴调查中,调查洞穴100多个,发现了大量哺乳动物化

发掘现场,后又向下发掘了半米左右,在清剥了几件骨化石后,熟悉人体每一块骨骼的吕遵谔教授,当即鉴定出其中一块为人的骸骨化石,并立即指示细心发掘,终于在揭开一大石块之后发现了金牛山人类化石,计有头骨一个(缺下颌骨),脊椎骨6个,肋骨2根,尺骨、桡骨、髌骨各1个,左右腕骨9个,左右侧掌骨各1个,指骨7件,跗骨11件,趾骨2件,耻骨13件,这些骨骼集中在1.6平方米的范围之内,无疑属于同

一个体。这次发现轰动了当时的科学界,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由于发现意义十分重大,获国家教委首次颁发的大学文科重奖。

两年之后,幸运之神又一次降临。1987年河北省徐水县文管所进修干部杨永贺在听了吕遵谔先生人体骨骼鉴定课后,记起《涞水报》曾报道过一个农民打地窖时发现“龙骨”的报道。闲聊中,吕先生建议他回去

作一些调查,并尽可能带一些标本回来。当这位干部几经周折找到这位农民时,说大部分骨化石已被一文物爱好者拿走,当杨永贺将剩下的几块带回送予吕先生后,吕先生眼睛一亮,当即判断,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人类化石,并根据叙述认为农民家里可能还有一部分未发掘出。后经发掘鉴定,除头部为农民敲碎不可复原外,其余部分几乎为一完整骨架,时代测定距今5万年。关于化石的研究工作仍在进行,根据髋骨和髌骨的研究,虽然涞水人化石只有5万年,但金牛山人身上所保留的原始性状却延续到涞水人身上。毫无疑问,涞水人的研究对了解东亚地区人类的进化历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金牛山人发现后,国内学者对金牛



在工地指导学生

石,其中有的十分罕见。

1975年,内蒙大窑发现一批石器,邀请吕先生前去指导。经过详细的调研,确定了大窑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制造场。

1980年,赴四川资阳发掘。资阳人是解放后发现的一处重要的晚期智人化石地点,但对其时代,学术界存有异议,这次发掘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珍贵资料。

1984年,为了解决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生的实习问题,同辽宁省有关单位协商,在金牛山A点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金牛山人类化石。这一地点在1974、1975和1978年曾由有关单位进行了几次发掘,已挖至距洞底10米深处。这次发掘,首先清理了以前留下的

山火的归属及年代，沉寂数十年后

提出了不少疑问，为此，吕遵谔教授决

不盲从，坚持一切以事实说话，因此

1986年正式启动了“金牛山古人类综合

研究课题”，由吕先生担任课题组组长，

对金牛山人遗址及其附近地区的地质构

造、洞穴发育、金牛山人生活时期的古

气候、古环境、年代学等进行了多学科

综合研究。这些工作有力地支持了发掘

工作的是葛源教授、王征小元、陈振南

、南京市博物馆邀去鉴定一古人类化石，这

又是人类学界一大发现。1993年底，

南京博物院在金牛山人遗址发现了

人化石的汤山葫芦洞进行考古发掘，受

国家文物局委托，吕先生担任队长，主

持发掘。在这次发掘中又获1枚人类牙

齿化石。南京人的发现对了解直立人的

面部特征、了解南方地区人演化历史中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70高龄的吕

先生仍雄心不减当年，在完成《南京人

化石地点》专著后，又开始金牛山人的

综合研究。仅行馆内，这些研究对古人

类学的发展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学科前瞻 寄语后人

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中国旧石

器时代学者已在世界上发现了大量的

古人类化石，为世界古人类学做出了重

要贡献。但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人类学

在理论和方法上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希望中国学者在今后的研究中，能更

加重视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使中国古人类

学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所长 张其南 2019年1月

（本文系张其南研究员在2019年1月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建所6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稿，有删节）

